

藏族 文物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文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253-038-6

I.藏... II.中... III.藏族—文物—中国—画册 IV.K 874.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9741号

藏族文物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良 李建雄

藏梵文校对 南加才让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制版 海龙视觉

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次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11.5

印数 3000册

书号 ISBN 978-7-80253-038-6/K·193

定价 220.00元

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拉巴平措 郝时远

学术顾问：熊文彬 一西平措 谢继胜 黄春和

主编：格勒 揣振宇

执行主编：张春燕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一西平措 文果 扎洛 王辰 吕军 张春燕
张丽 格勒 谢继胜 黄春和 黄行 揣振宇 熊文彬

摄影：王辰

图版说明：张丽

编者的话

这本《藏族文物》画册（以下简称画册）付梓之时，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早在200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就计划在北京建设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2006年5月18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时，为中心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指出：“要努力建设全国乃至世界藏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人才中心、文献中心、出版中心、信息中心和展示中心，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中央领导的指示既为中心今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又为中心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建设全国乃至世界藏学“展示中心”的要求，使酝酿已久的“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国家发改委申请立项，获得批准；2007年4月18日，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开工建设。

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是北京唯一的国家级藏族文化博物馆，其基本定位是：西藏及其他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展示中心；国内外认识和了解藏族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开展对外宣传和反分裂斗争及爱国主义教育和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的基地；藏学研究和信息资料的平台；首都文化生活的一个观光景点。其任务是通过大量的实物、史料来展示藏族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描述”有史以来藏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模式；汉藏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事实；具有浓郁藏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实例；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和全国支援西藏政策指引下西藏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际、国内藏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等等。目前，我们正积极努力地将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建设成内容丰富、主题独特、形式多样的体系，即较全面地展示藏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

内容和发展成就的专题性基本陈列,与国内外博物馆交流合作或配合国家外宣工作重点的临时展览,以及直观展示藏族文化、艺术和民俗的演示活动。

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筹备办公室成立伊始,在筹备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组建了由故宫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19名文博专家、展务专家、文物鉴定专家及藏学专家参加的专家组,参与筹备。在工作中我们紧紧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每次方案的制定和每次展品的鉴定都要召开专家座谈会进行反复论证。此画册也是缘于专家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早,学者在长期的社会调查中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各民族的珍贵文物,多年来因各种原因,他们想建一座博物馆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而使得许多人无法欣赏到这些艺术珍品。建议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合作。”鉴于此,我们随即与该所的揣振宇书记进行了商谈,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在双方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的合作逐步深入,到今天这本画册问世,应该说取得了合作的第一阶段成果。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领导对这本画册的出版十分重视,拉巴平措总干事和郝时远所长亲任画册的总顾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建议将此画册作为“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系列丛书”的第一部;中心副总干事、博物馆筹备办领导小组组长格勒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书记揣振宇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研究员熊文彬,首都师范大学藏传佛教美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谢继胜,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尚士雅集文化顾问公司专家一西平措等是此画册编撰工作的主要专业指导,他们审阅了所有的图版及文字说明,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他们严谨的学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使我们的合作默契而愉快。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为画册的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在此我们谨致以诚挚的谢意!最后,我们也要感谢筹备办各位同仁的全力投入和辛勤劳动。

编委会

2008年3月28日

序 言

结集出版所藏文物图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同仁多年以来的夙愿。现在,“藏族文物”作为所藏文物图集的首卷就要面世了,借此机会,我简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所藏文物收集和图集编辑出版的过程及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本画册收录的文物照片,许多就是从那时开始征集和收藏的。当时,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指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同志亲自主持此项工作,组织大批学者和辅助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就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等展开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在进行这项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大调查期间,民族研究所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数十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电影资料片,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视角记录了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历史变迁、文化制度、宗教仪式和文字文献等,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音像资料。在拍摄过程中,各调查小组还注意收集拍摄中使用过的各种器物,为建立民族文物室做准备。与此同时,正在各民族地区进行大调查的工作组,也着意收集了各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用具、服饰等文物,数量可观。

1962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合并,沿称民族研究所。研究所内设“民族文物电影资料室”,简称“文物室”。当时的规划是: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旁兴建一栋科研办公大楼,拟设专门的文物库房和陈列室,对所藏文物集中保管、陈列和研究。后因国家陷入经济困难,建楼计划中途下马,文物库房和陈列室的设想也随之落空。十年“文革”动乱期间,这批文物曾被送到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封存，由民族所委托专人看管，直至1974年才又被运回本所。其间，有部分文物遭虫蛀或破损。

由于民族大调查时不同民族地区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进展参差不齐，因而我所对不同民族的文物收藏呈现出不平衡状态。收藏较多的有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的文物，包括桦皮船、鱼皮衣、狍头帽、萨满服等罕见的珍贵文物。1983年黑龙江省民委筹建民族博物馆时，这批文物被转拨借展。

藏品中还有许多黎族、纳西族、瑶族、布依族、彝族、珞巴族、僮人等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其中一些古朴而独特的器具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绝迹，成为这些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见证。

1963年冬，在所领导的支持下，我所筹建中的文物室工作人员，还从北京的寄卖商店收购了一批蒙藏僧俗上层使用过的具有文物收藏价值的衣饰和织物，如绫罗绸缎、衣袍、帽靴等。

藏品中有关藏族的文物，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所科研人员在藏区各地从事田野调查时收集的，小部分是用相关藏品与其他博物馆交换而来的。本册图集收录的最为珍贵的藏族文物，是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藏品，其数量虽然不多，却具有独特的价值。

由于收集渠道的广泛性和特殊性，我所藏族文物的种类多，地域分布广，年代跨度长，文化风格多样。例如藏品中的金铜佛造像，有早至12世纪的印度波罗风格上乐金刚，有13世纪元代典型的释迦牟尼像，有数尊造型精巧的明宣德前后的无量寿佛像，还有带罕见阳文题记的夏玛尔巴三世金铜像。此外，像海螺法号、藏刀、装饰精美的火镰、锦缎藏服等文物，也多为未见或鲜见于其他文博单位的精品或珍品。

民族文物既是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各个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等丰富的实物信息；也是解读不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途径和重要依托。所以，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民族文物收集与研究不可或缺，做好民族文物收集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本画册收录的藏族文物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50年来在藏族地区实地调查与藏学研究成就的见证，充分展示了我所力图建立包括民族博物馆学在内的完整的民族学研究规划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将以《藏族文物》图集面世为契机，有计划地对所藏其他少数民族文物进行整理、编辑并陆续出版，推出所藏少数民族文物图集系列，以飨读者，并以此告慰当年为收集少数民族文物付出辛勤劳动的先辈们。

本图集的出版，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筹备办的大力协助，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博物馆筹备办张春燕主任的热情指导与推动，特此鸣谢！

揣振宇

2008年4月21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编委会 /1
序言	揣振宇 /3

藏传金铜造像风格的发展	熊文彬 /1
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	黄春和 /14
两尊藏传铜座银身像的分析	谢继胜 /24
释迦牟尼像说	—西平措 /30

祖师

莲花生	40
莲花生	42
米拉日巴	44
米拉日巴	46
夏玛尔巴三世	48
宗喀巴	50
宗喀巴	52

本尊

金刚萨埵	56
------------	----

大持金刚	58
胜乐金刚	60
胜乐金刚	62
密集金刚	64
喜金刚	66

五方佛和般若佛

无量寿佛	70
无量寿佛	72
无量寿佛	74
无量寿佛	76
无量寿佛	78
释迦牟尼佛	80
释迦牟尼佛	82
释迦牟尼佛	84
释迦牟尼佛	86
弥勒佛	88

菩萨

文殊菩萨	92
金刚手菩萨	94
金刚手菩萨	96

佛母和空行母

白度母	100
绿度母	102
叶衣佛母	104
那若空行母	106

护法神

吉祥天母	110
布禄金刚	112

擦擦

章嘉·若贝多杰	116
---------------	-----

大威德金刚	117
长寿三尊	118
绿度母	119
那若空行母	120
六臂大黑天	121
狱帝主	122
白布禄金刚	123

佛塔

佛塔	126
佛塔	127
佛塔	128
佛塔	130

法器

鼙鼓	134
鼙鼓	135
鼙鼓	136
鼙鼓	137
镶翅法螺	138
苯教法器——钹	139
内供颅器	140
金刚杵	142
金刚铃	143
金刚铃	143
金刚铃	144
碰铃	144
金刚槌	145
香熏炉	146
兽耳香炉	148
供盒	150
模具	152
嘎乌	153
嘎乌	153
嘎乌	154

嘎乌·····	155
---------	-----

民俗类

火镰·····	158
藏式腰刀·····	160
高足瓷碗、镶铜皮碗套·····	161
包铜鍍花皮碗套·····	162
书写板·····	163
鍍花银质眼镜盒、水晶眼镜·····	164
背靠垫·····	165
莲凤锦缎长袍·····	166
四相缎长袍·····	167
剪绒长袍·····	168

藏传金铜造像风格的发展

熊文彬

藏传金铜造像主要以诸佛菩萨造像为主，种类繁多，将佛教后期“像教”的趋势发展得淋漓尽致，可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从现存作品数量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艺术在规模、数量上能与之匹敌。西藏浇铸金铜造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前的古老西藏，因为据《新唐书·吐蕃传》、《旧唐书·吐蕃传》和《册府元龟》等著名的汉文古籍记载，古代西藏在佛教传入之初就不仅有了成熟的金铜雕塑作品，而且其中一些上乘作品还成为重要的馈赠品。如公元646年松赞干布的重臣禄东赞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七尺多高、用黄金铸成的金鹅，祝愿唐太宗东征马到成功；^[1] 657年吐蕃赞普向唐高宗赠送了一座金城，上有狮子、象、驼马、羊和骑士。

动物雕塑是佛教传入西藏前和传入之初西藏金铜雕塑的主要题材，疑与佛教传入前古老的苯教图腾崇拜和高原游牧文化有关。图齐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收录的部分作品即体现出这一特征。这些作品包括源于日喀则的青铜护身符。这件作品的造型十分奇特，由四只连体鸟组成，其中每只鸟均为一身双头。同时，还有青铜猫科动物、衔环的青铜小熊。此外，则布隆地区出土的十二生肖动物雕塑已经开始上色，用圆形来体现时间和空间，下半部凹形的构图中分别雕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上半部分横列造型有佛教的宝伞、金鱼、宝瓶、莲花、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等八吉祥。^[2] 动物和八吉祥的刻画自然写实，风格古朴。它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佛教传入西藏后古老文化信仰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史前这种写实、朴素的动物雕塑传统在随后的吐蕃时期依然十分流行，其中不乏造型优美、技艺精湛的雕塑杰作。这些实物和文献记载充分证明，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就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金铜雕塑制作工艺了。

据藏文史料记载，佛教雕塑最早于公元6世纪左右出现在古代西藏的王宫。相传在拉脱脱日年赞赞普时期，突然从天上降下了四种密宝。当时的人们出于对天神的崇拜和敬仰，尽管对佛教的四种密宝一无所知，但仍将其作为圣物供奉在王宫雍布拉康中。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而言，这四件密宝中就包括后世极其流行的佛塔。尽管这则神话传说已经极其遥远，无从考证，但却表明佛教艺术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进入古老西藏的。公元

[1] 参见《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

[2] 图齐著，向红笈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图版15-25，1987年。

7世纪初,随着佛教大规模的传入,佛教艺术也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并且对西藏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佛教的大规模传入,及其寺院的不涌现,对佛像及其相关题材的雕塑创作提出了巨大的需要。因此,在西藏本土雕塑艺术传统基础上,不断吸收印度、中原内地、尼泊尔等佛教艺术精华而形成的崭新艺术形式——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一跃成为西藏雕塑艺术的主体。

一、吐蕃时期(公元7—9世纪)的金铜造像

作为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主要种类之一的金铜佛像艺术,与整个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和繁荣等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中,吐蕃时期,亦即藏传佛教的前弘期,是金铜佛像雕塑萌芽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期,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在强盛时期几乎囊括了包括今天尼泊尔部分地区、克什米尔地区,以及我国新疆、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的部分地区,一度控制了东西方的重要商业、交通和文化通道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吐蕃社会对外采取开放政策,大力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文化。成功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开放措施加强了与丝绸之路周围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从而带来了吐蕃社会欣欣向荣的局面。佛教及其艺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陆续进入吐蕃社会的。

佛教及其艺术从两个方向大规模同时传入吐蕃。唐朝的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和赤尊公主从尼泊尔带进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是佛教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入吐蕃的重要标志。在松赞干布和随后各代赞普及其皇室成员的积极扶持下,大规模地展开了兴佛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修建寺院。今天仍矗立在西藏的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桑耶寺和噶曲寺等著名寺院就是在吐蕃时期修建而成的。

佛教在吐蕃的最初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强大阻力。佛教文化传入吐蕃之前,西藏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教占据绝对优势。佛教传入之后,在吐蕃社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佛教和苯教的文化大战。二者势均力敌,彼此时消时长。尽管在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最终在9世纪中叶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时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朗达玛灭法事件。此后,吐蕃王朝崩溃,佛教势力一蹶不振,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佛教进入了传统史学家和佛学家称之为的“黑暗时期”。

此时期佛教寺院在古老西藏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促进了佛像雕塑和绘画艺术的兴起,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序幕。从藏传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来看,包括金铜佛像雕塑在内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具有两大突出特点:

1. 各种艺术风格大放异彩

吐蕃对外实行的开放策略带来了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吐蕃社会吸收的佛教不仅有印度、尼泊尔传播的佛教,也有唐朝腹地和以于阗为首的西域佛教。各种佛教艺术风格随着各自的佛教一起传到了吐蕃。其中,印度和唐朝的佛教艺术占有突出的地位。

据文献《五部遗教》和考古报告,大昭寺是以印度超岩寺为模式修建而成的。大昭寺中心佛殿一、二两层建筑就是其中最早的遗存。其为外侧砌砖、石承重墙与内侧木构架相结合的内院式建筑,平面呈方形,内开小室、回廊和天井,整个布局与印度佛寺建筑中的僧房院极其相似,印度风格显然。与此同时,中心佛殿殿门、廊柱的形制及其木雕也为印度风格。而与大昭寺同时修建的小昭寺和查拉鲁普石窟寺则体现出明显的汉式风格。据《贤者喜宴》记载,小昭寺由文成公主主持修建而成,门东向,屋顶采用汉地宫殿样式。不仅如此,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石窟寺查拉鲁普的布局也受到了内地石窟寺的强烈影响。现存查拉鲁普石窟寺为礼拜道环绕的中心柱石窟,中心柱为方形,在中心柱四面和礼拜道四周均雕满了诸佛菩萨和王公大臣造像,其形制与河西、敦煌一带流行的中心柱石窟寺完全相似。至于此时的尼泊尔艺术品,在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吐蕃时期尼泊尔工匠相继参与了大昭寺、达瓦扎摩崖造像和查拉鲁普石窟寺石雕的创作。此外,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受到了于阗佛教艺术的影响,据《贤者喜宴》记载,昌珠寺建寺之初的部分金铜佛像作品就是按于阗风格浇铸而成的。该史籍明确记载:菩萨等诸佛像,由于阗化身的工匠按照于阗佛像造型浇铸而成,而有关的珠宝饰物则来自尼泊尔。书中说由菩萨役使夜叉按照八升、七升、六升、五升和四升黄金的不同规格依次浇铸了大日如来佛、金刚萨埵、宝生佛和不空成就佛等佛像,并将他们安请在无量寿佛殿之中。显而易见,吐蕃在藏传佛教的初创阶段,雕塑艺术采取的也是兼收并蓄的策略。

2. 从学习、借鉴、模仿到融合、创新

在藏传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佛教艺术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进入吐蕃社会后,吐蕃社会自然要学习、借鉴和模仿这一崭新而又陌生的艺术形式和内容。这是一个从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在文献中我们看到:部分艺术品是从域外直接输入吐蕃社会的,如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分别从长安和加德满都请进的释迦牟尼佛像;部分艺术品是由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在吐蕃创作而成的;部分艺术作品则是藏人按照域外艺术风格和形式仿制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西方为数众多的西藏艺术研究者得出了早期的西藏没有藏人自己创作的作品的片面结论。事实上,几乎在域外佛教艺术传入的同时,域外和吐蕃艺术家就开始探索如何将全新的域外艺术从内容到形式同自己固有传统艺术相结合的途径。据藏文文献,公元763年修建的西藏第一座有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其建筑在采用域外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坚持了吐蕃建筑的民族传统。其中的三层主殿分别按藏族、汉族和印度艺术的三种风格完成。主殿一层是按藏式建筑风格建造的,殿中央按藏族雕塑风格塑有释迦牟尼佛及其胁侍共13尊塑像,其中释迦牟尼佛右侧塑有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喜金刚和三界尊胜明王,左侧塑有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除障盖菩萨和不动明王。二层是按唐朝建筑式样建成,殿中央塑有大日如来佛,右边塑有燃灯佛,左边塑有弥勒佛,前面塑有释迦牟尼、药师佛、无量光佛,左右塑八大近侍菩萨和金刚明王等。第三层系依印度建筑风格修建,主尊为大日

如来佛,其胁侍八大近侍菩萨、十方诸佛、不动明王和金刚手等塑像也都根据印度风格立塑而成。赤德松赞于公元776年修建的噶曲寺也遵循了这一传统,即将域外艺术与自己的艺术传统融合在一起。噶曲寺高九层,其中底层及其殿堂按藏族风格修建;第二、三层由于阆艺术家按于阆风格修建;第四至六层由来自白曲地方的汉族艺术家按汉式风格修建;顶上的三层则由印度艺术家按印度风格建造而成。赤德松赞之子赤祖德赞即位后遵循祖制,继续坚持了这种在传统艺术基础上融合域外艺术的传统。他在温江岛为自己建造的九层高的贝美扎西格沛寺,也同样体现藏族传统艺术与印度、唐朝、尼泊尔和克什米尔艺术有机融为一体的传统。域外艺术与本土艺术传统的融合不仅体现于建筑艺术之中,还表现在雕塑和绘画等各种艺术领域。藏文史料《拔协》和《贤者喜宴》在记述桑耶寺的度母殿修建时说:莲花生大师建议赤松德赞在桑耶寺先修建一座度母殿。赤松德赞于是在桑耶寺南面进行修建,当殿顶即将完工时,赤松德赞对莲花生大师说:“殿堂已经完成,并且建得十分漂亮,但里面没有佛像。”莲花生大师于是说:“准备材料,马上就要来一位艺术家。”尔后,从亨本比哈比来了一位名叫藏玛坚的汉族或印度艺术家,手拿颜料钵和一捆画笔,宣称:“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雕塑家和画家,是为吐蕃赞普修建寺院的艺术师。”接着,赤松德赞、莲花生大师和这位艺术家就如何绘塑佛像等问题进行了协商。艺术家问道:“佛像是按印度风格,还是按汉族风格塑造?”莲花生大师说:“正如佛出生在印度一样,当然按印度风格绘塑。”然而,赤松德赞说道:“大师,我希望好战的藏人成为佛教徒,还是让他按藏族风格绘塑诸佛菩萨吧!”莲花生大师因此说:“召集吐蕃百姓,按藏族风格绘塑诸佛菩萨!”于是,在召集而来的吐蕃百姓中,以俊美男子鞠·悉诺察卜为模特儿塑造了度母殿中的卡萨巴尼观音菩萨像;以漂亮女子交绕·布琼为模特儿,在卡萨巴尼观音菩萨左侧塑造了摩立支天像;以美貌女子交绕·拉布美为模特儿,在右边塑造了度母像;以塔桑·悉诺列为模特儿,在度母右侧立塑了圣度母像;以梅·叶哥为模特儿塑造了护法神马头明王像。^[1]这段史料不仅证实藏族雕塑传统中固有的艺术风格的存在,域外艺术与西藏本土艺术融合的过程,而且还表明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以藏人形象为模特儿进行了塑制。布达拉宫现存松赞干布雕塑就是这一风格的重要代表。松赞干布所穿大翻领长袍显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例证。现存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造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例证。如西藏昌都察雅县的仁达、芒康县大日如来寺和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的大日如来组像和礼佛图都是这一风格的作品。

后世学者将吐蕃时期的金铜佛像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分别称之为早期法王塑像、中期法王塑像和晚期法王塑像。

(1)早期法王金铜雕塑指法王松赞干布时期资助铸造雕塑的红、白金铜塑像。其特点是佛像面部饱满,眼睛细长,鼻子坚挺,嘴部棱角分明,下颊丰厚,面部较长,衣褶稀少,莲花座多雕单层或双重莲花,十分精美。有的佛像不雕塑莲花座,只做一个简朴的

[1] 拔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厚垫。法王塑像身披半月披风，足着藏靴，塑成吐蕃人形象，大多装彩镀金，光彩照人。

(2)中期法王金铜塑像指在法王赤松德赞时期浇铸的佛像，佛像大部分供奉在桑耶寺格吉金铜佛像殿中。风格为面部较圆，颜色较深，多用紫铜合金的紫青铜铸造。佛像面部装彩较厚，其工艺较之于早期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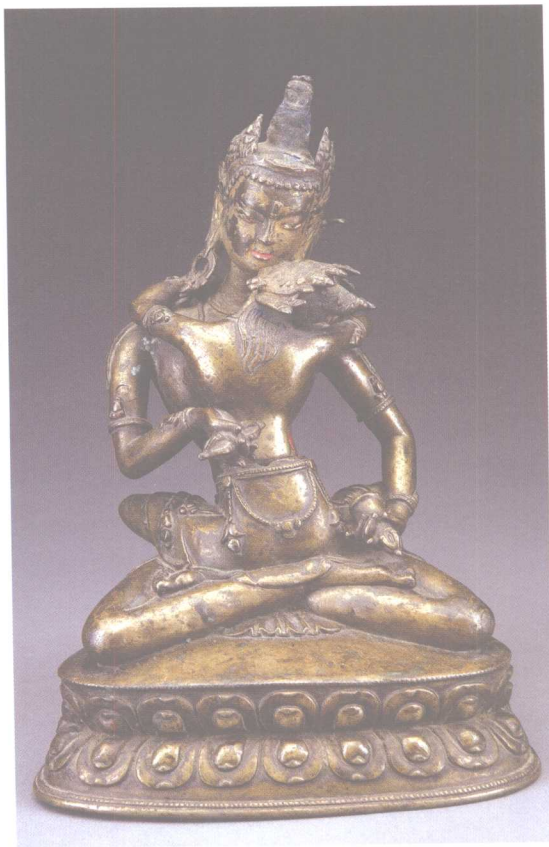
(3)晚期法王青铜塑像是指法王赤祖德赞时期浇铸的佛像。材料多用白铜合金的白青铜。佛像大多出于印度雕塑家之手，风格与9世纪同期印度佛像风格十分接近。但较印度佛像丰满，姿态灵活。多用银和紫铜镶嵌细部，如用银嵌瞳孔或眼睛，用紫铜作角膜或舌头。^[1]

二、后弘期初期(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金铜造像

公元9世纪中叶，随着朗达玛赞普在西藏腹地推行的大规模的灭法活动，佛教被宣布为非法，僧人被迫还俗或者改宗苯教或者逃至偏远地区避难，部分寺院被毁或改作它用，著名的大昭寺也变成了屠宰场。寺院中的金铜佛像和其他质地的塑像以及壁画也难逃厄运，大多被毁。这场肇端于政治和宗教纷争的文化浩劫对藏族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和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辉煌达两个多世纪的吐蕃王朝也结束于这场浩劫，王朝四分五裂，曾备受王朝上下崇信的佛教销声匿迹。朗达玛赞普遇刺身亡后，他的两个儿子云丹和微松为王位争执不下而各据一方。最后，云丹控制了拉



持兵器喜金刚 12世纪



金刚萨埵 13世纪

[1] 白玛噶波：《金铜佛像鉴赏》（藏文本）第17页，见《白玛噶波文集》，印度巴伦普尔影印本，1970年版。